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全球亟须一场关于“行动”的谈判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子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规模最大的线下国际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10月31日在英国格拉斯哥正式开幕。作为《巴黎协定》进入实施阶段后召开的首次缔约方大会，COP26被认为是将世界从气候变化临界点拉回来的“最后、最好的机会”。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计划2020年召开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延期到今年。虽然疫情形势仍不乐观，但仍有超过两万人冒险选择在格拉斯哥线下相聚。大会主席阿洛克·夏尔马在开幕致辞中说：“气候变化的脚步并未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而暂停，我们共同的星球正变得更糟。”世界气象组织最新发布的《2021年全球气候状况》临时报告显示，过去7年，地球上出现有史以来的最高温度，海平面高度也再创新高；“创纪录的温室气体浓度和相关累积热量已将地球推向未知”。

作出关于“行动”的承诺，是各方对COP26的最核心期待。大会主办方表示，“巴黎设定了目标，格拉斯哥必须让它成为现实”。评估减排力度、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落实气候资金承诺，是COP26最紧迫最重要的三项任务，同时也是历届气候大会扯皮已久的老难题。“如果我们想取得真正的成功，需要展现更大的雄心，采取更多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只有激发更大的政治意愿，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这需要信任，而目前最缺失的就是信任。

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王瑞彬认同古特雷斯的观点。在王瑞彬看来，要客观评估摆在COP26面前的现实困难，仅靠一次会议就解决所有问题并不现实。就目前形势看，COP26与会各方更多的是在谈“选择性”：《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是否还要保持；如果仍需保持，哪些具体领域能够取得突破、哪些具体措施能够落到实处，气候融资缺口能够缩小到什么程度；全球气候合作进程是否还要进一步深入，等等。

G20峰会为COP26“预热”不成功

不少参加COP26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是从罗马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上直接飞往格拉斯哥的。G20由19个国家和欧盟组成，代表了世界上大多数最大的经济体，也是联合国此次敦促减排的重点目标。这些国家占世界生产总值的90%左右，占国际贸易总量的75%至80%，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古特雷斯曾明确表示，气候行动必须由G20牵头。鉴于应对气候变化也是本次G20峰会的一个重点，此前很多声音表示，希望G20峰会能为在COP26上实现气候问题突破铺平道路。

然而，G20峰会在应对气变方面的成果并未达到预期。根据10月31日公布的G20峰会宣言，G20仍然承诺《巴黎协定》目标，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2℃之内，并努力将其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之上的1.5℃之内，同时呼吁所有国家作出重大且有效率的承诺和行动。但是，G20领导人只承认“在本世纪中期前后”实现净零排放的“关键相关性”，措辞里删除了此前版本中提出的“2050年”期限，让目标变得不那么具体。

王瑞彬分析指出，虽然G20领导人首次在正式声明中提到“1.5℃”的目标，与COP26希望设定的“到本世纪中期确保全球零净排放并保持1.5℃‘触手可及’”目标一致，但G20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具体承诺。

德国之声批评称，G20峰会没有给出实质性的气候行动时间表，没有提出更高的减排目标，没有提出让煤炭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计划，这些都令环保人士的希望落空。这也意味着把应对气候变化的难题留给了COP26大会。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总干事詹妮弗·摩根认为，“如果G20是COP26的预演，那么各国领导人的行动是不力的”。古特雷斯称，他“带着失望离开罗马”。

COP26要达成协议并不容易

从11月1日举行的COP26领导人峰会看，摩根的担忧很可能成为现实。首日峰会取得的唯一成果是，各国领导人承诺在2030年前停止和扭转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的趋势，并为相应国家提供190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资金用于保护和恢复森林。

英国首相约翰逊以007特工詹姆斯·邦德的比喻开场，希望人类能够拆除气候危机的“炸弹”。

当地时间11月2日，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英国首相约翰逊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新闻发布会上，赞扬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环境治理，肯定中国的碳达峰和碳中和承诺意义重大。 视觉中国供图

美国总统拜登为上届美国政府退出《巴黎协定》道歉。印度总理莫迪提出到2070年实现“碳中和”，比联合国期望的时间节点晚了20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8年提出，“全球碳排放量需要到2050年达到净零排放，才能有三分之二的机会使升温保持在1.5℃以下”。印度目前是世界第三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就在COP26开幕前夕，印度还坚持拒绝设定净零碳排放目标，说煤炭将继续在印度发挥“关键和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要求富国承认对全球碳排放负有“历史责任”。

对于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歧，王瑞彬形容为“陷入死结”——发达国家承诺得很多，但兑现得很少；发展中国家发展任务繁重，整体进程缺乏效率。路透社称，COP26谈判将集中体现在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公平和信任问题上，前者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了气候变化，后者则被要求在财政支持不足的情况下实现经济脱碳。

2015年，达成控温共识的《巴黎协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COP21）上通过，成为继《京都议定书》后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该协定提出，各方同意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内而努力。与会各国还同意每隔5年作一次进展评估，在回顾的同时确定下一步方略。COP26的重要议程之一，正是进行这一评估。不过，在以往几次缔约方大会上，各方始终未能就实施细则的核心遗留问题达成一致。这意味着，一旦此次COP26谈判不能最终在行动方面落实，《巴黎协定》只能沦为一纸空文。

《巴黎协定》第六条，是掣肘历次谈判的核心争议之一。该条款主要解决如何通过市场及非市场机制，帮助各国实施其在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但是，因为涉及经济利益，如何监测、计算和报告各国的自主减排成果，如何在国际转让中避免双重核算，《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遗留的减排配额是否应被纳入2020年后的国际碳市场等，这些关于减排的具体国际规则至今仍未形成进一步方案。

此外，虽然很多国家都带着雄心勃勃的2030年新气候目标参加COP26，但是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统计，190多个缔约方中只有120个国家提交了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该机构在大会开幕前夕发布的《2021年排放差距报告》还清楚地指出，按照目前世界各国的减排措施，到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2.7℃，远高于《巴黎协定》提出的“2℃以内”的目标。

雪上加霜的是，就在COP26开幕前不久，全球范围内发生了一系列因供应链中断、通货膨胀等因素引发的能源危机。加上消费端需求复苏和寒冬来临，很多发达国家重新回到了发展、使用化石燃料的老路上。比如英国就重新启用了火力发电站，欧盟一些国家也在考虑开放燃煤和石油工厂，以避免冬季停电。

对于发展中国家关注的气候融资问题，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今年9月发布的报告，发达国家2020年提供了约800亿美元资金，仅完成了此前千亿美元承诺的80%。“资金始终是关乎应对气候变化成败的决定性因素。”王瑞彬认为，气候资金的市场机制关键是要可持续，如果没有回报，行政力量很难真正发挥作用。

“要在COP26上达成协议，比巴黎气候大会时更为艰难。”大会主席夏尔马在开幕前夕就如此表示。英国首相约翰逊也认为，COP26只有60%的机会取得成功。

“小气候”不明朗 中美能否合作应对全球“大气候”？

尽管古特雷斯多次呼吁全球合作起来应对气候变化，但王瑞彬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坦言，随着大国竞争态势的加剧，各国在气候问题上合作的温度在下降。

10月31日被问及“为何G20气候承诺不够深入”时，美国总统拜登却无端指责俄罗斯和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缺乏承诺”。一些西方媒体随后呼应拜登的“甩锅”论调，比如英国《太阳报》称，如果本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未能带来改变，那么，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应该受到指责”。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1月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欧盟将用71年，美国用43年，日本用37年，而中国给自己规定的时间只有30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这需要中国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充分体现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大国担当。

11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COP26世界领导人峰会书面致辞中，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维护多边共识；第二，聚焦务实行动；第三，加速绿色转型。“习主席的致辞不长，但很务实，也很有底气。”王瑞彬认为，“三点建议”中，第一点就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多边主义是良方”，展现出中国秉持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理念，呼吁各方增强互信、加强合作。

有分析称，中美是世界前两大温室气体排放国，COP26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能否提供推动力。曾参与《巴黎协定》谈判和签署过程的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近期表示，没有中美合作就不可能达成《巴黎协定》，“希望这一次中美之间能有像2015年那样的合作”。

今年以来，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两次通话中都谈到了气候合作问题。作为美国政府气候特使，美国前国务卿克里今年已经两次访华。10月31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罗马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双方也就气候变化议题交换了意见。

虽然中美双方均表示重视共同推进在气候变化领域合作，但难点在于，如何在两国“小气候”不明朗的前提下合力应对全球“大气候”。克里曾表示不会用气候问题和中国“做交易”，但在今年6月，美国政府却以“强迫劳动”为由，对中国新疆光伏产业的一家大型企业及其子公司限制进口，将太阳能供应链与所谓人权问题相联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此前曾强调，中美在具体领域的合作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必然与整体中美关系息息相关；不应指望一方面肆意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在双边和全球事务中给予理解和支持。

关于气候领域的合作和责任，汪文斌11月2日进一步表明了中方立场。他说，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关乎人类前途命运，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发达国家应切实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率先承担大幅减排义务，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挑战的能力。与此同时，美方“不能一方面要求中方减煤，一方面又制裁中国光伏企业。”

本报北京11月3日电

中国在联合国的角色：从受助者到合作者、支持者

——中外各界代表纵论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50年历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文利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此后半个世纪中，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11月2日，由联合国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共同主办的“中国与联合国：50年合作历程与未来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驻华代表、多国使馆官员和中国社会各界代表，回顾新中国与联合国相互支持、共同成长的历史，探讨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如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新挑战。

1979年，联合国在中国成立了第一个办事处。从那以后，中国社会在联合国的见证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均GDP从1979年的180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1.12万美元；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教育水平、医疗保障都有了大幅提高。1979年的中国与2021年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在联合国的角色，已经从受助者转变为合作者、支持者。”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常启德，在论坛致辞中如此褒奖中国发展成就，以及在经济实力提升前提下为联合国提供的多方面支持。他说，中国与联合国在一系列多边框架下携手合作，包括开展“南南对话”、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常启德表示：“联合国是值得中国信赖的合作伙伴，未来将继续与中国政府和人民风雨同舟，共同推进‘乡村振兴’和‘2060年碳中和’等目标。”

中国重返联合国舞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恢复新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赞成票中，三分之一来自非洲。同样，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也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如今，中国在推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平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自1990年起，中国共计派遣超过4万人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中参与维和行动人数最多的国家，活动足迹遍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驻非洲）联合国维和部队中，到处都能看到中国官兵的身影。”非盟驻华代表赫曼塔拉·默罕默德·奥斯曼，对中国为非洲和平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深表赞许。他回顾了1971年非洲多数国家投票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同时也感谢中国对非洲独立事业的支持。他指出，中国积极响应联合国倡议，为非洲提供资金、物资、技术等援助，帮助非洲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世界表明，中国是非洲真正的伙伴。”

当下，新冠肺炎疫情的阴影还未散去，一场规模更大、影响更远的全球危机又迫在眉睫。今年8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了一份经195个国家审议和批准的气候变化报告，以史无前例的严厉措辞指出，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之为对人类的“红色警报”，敦促各国立刻采取切实行动遏制气温上升，避免不可逆转的灾难发生。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常启德致辞。 CCG供图

2015年，联合国达成《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气候协议》，这是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里程碑事件。中国政府欧洲事务特别代表吴红波见证了签署协议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也参与了多年来中国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历程。在本次论坛上，他介绍了今年9月发布的《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并展示了10月在昆明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成果——中国承诺提供15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

在论坛发言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夏泽瀚，肯定了中国在生态文明、技能转型和文化保护领域的成就，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的合作大有可为。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国别主任安思齐注意到，中国女性在劳动市场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希望能进一步缩小性别差距。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芮心月表示，中国是最早签署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之一，中国青少年儿童的卫生、教育、福利等状况在短短数十年间就取得了长足进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值得借鉴的榜样。

曾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的马凯硕曾经说过，联合国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组织之一”，《联合国宪章》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文件之一”。《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制止侵略行为、调解国际争端；发展国际间友好关系，促成国际合作；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宪章》还规定，任何会员国不得侵害他国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对此，作为“全球主义者”和“多边主义倡导者”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深有同感。“联合国是把全世界每个角落的每个人团结起来、解决每个问题的地方。”王辉耀说，50年来，无论国际局势如何风云变幻，中国始终坚持参与联合国治理体系，为打造更团结、更多元的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踏上下一段征程之际，衷心希望中国和联合国的未来将是更务实、更开放的未来，为打造网络化多边主义、促进包容性增长而共同努力。

本报北京11月3日电

中拉青年：做和平发展的青春同路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文利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扶贫方面的经验比中国更加丰富。短短几十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让8亿人摆脱贫困，这是人类历史上取得的里程碑式功绩。中国不仅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更为世界提供了发展和消除贫困的样本。”在2021中拉青年发展论坛上，拉共体轮值主席国墨西哥驻华大使施雅德呼吁，发展中国家应该就扶贫与发展问题深化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

2021年，中国历时8年的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中之重——消除贫困。中国的伟大成就，让深受新冠肺炎疫情之苦的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希望。

为了携手消除贫困、推动共同发展，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日前主办了中拉青年发展论坛。来自中国、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巴西、古巴、厄瓜多尔、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10个国家的70余名青年代表深入探讨“发展”话题，为促进全球减贫事业和经济复苏贡献青年主张。

在不同国家的代表心中，“发展”的内涵和目标不尽相同。与中国同为“金砖国家”的巴西，意识到了消除贫富差距之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作为拉丁美洲最大的左翼政党之一，巴西劳工党青年委员会全国书记罗纳德·索里索主张反对霸权、加强国家投资、促进区域一体化。巴西曾在劳工党执政时期推行“零饥饿计划”，让“全体巴西人能吃上早饭、午饭和晚饭”——这与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理念不谋而合。罗纳德·索里索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扶贫成就，值得拉美国家和全世界学习。”

在秘鲁，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创造更多社会财富，还在于降低犯罪率、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秘鲁内政部顾问比奥莱塔·贝阿斯指出，极端贫困是导致人口贩卖在秘鲁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新冠肺炎疫情又让原本就弱势的人群进一步失去教育、工作和社会保障的权利，这个群体更容易成为犯罪活动的受害者。

对深受封锁之苦的委内瑞拉来说，“发展”意味着首先要扫除霸权主义障碍。委内瑞拉国民议会代表、统一社会主义党成员尼古拉斯·马杜罗·盖拉认为，“新殖民主义”是造成委内瑞拉近年社会持续动荡的罪魁祸首。他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创造更人道、更公正、更多元的世界，并希望委中两国在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深入合作，因为“中国经验能帮助拉美国家战胜贫困”。

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为拉美国家带来了更多的机遇。阿根廷拉美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迭戈·马索科内是个地道的“中国通”，他敏锐地察觉到，近年来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连年上升，内需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中国由出口国转变为进口国，尤其是进口食品的消费越来越高，“这对拉美国家而言是很好的机会，给拉美企业和创业者带来了大量商机”。

2021中拉青年发展论坛现场。 全国青联供图

时至今日，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许多国家蔓延。如何在复产复工的同时保障人身安全，是各国面临的普遍难题，也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从2020年起，中国将一批又一批新冠疫苗运往拉美各地，并与当地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开展疫苗临床试验与批量生产，大大提高了疫苗的可及性和公平性，帮助疫苗短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渡过难关。

“人在春风得意时遍地是朋友，但身处低谷时却往往一个朋友也难寻。”墨西哥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劳工政策和机构关系司司长阿莱杭德罗·恩西纳斯·纳赫拉的发言颇具哲理：“疫情暴发期间，墨西哥找到了真正的朋友——中国。”他说，中国不但帮助墨西哥，也帮助了很多拉美国家，体现了“手足般的情谊”。

“我接种了两剂疫苗，是由中国研制、巴西生产的克尔来福疫苗。”在中拉青年发展论坛上，巴西劳工党青年委员会国际关系顾问亚历山大·普波，向中国表达了真挚的感谢。他也希望中国与拉美国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全球合作伙伴关系。

在全球携手抗疫中，青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第一书记阿依林·阿尔瓦雷斯·加西亚在论坛上谈到，面对日益严峻和复杂的全球危机，青年组织之间的交往与合作愈发重要，“在利己主义和市场法则将人类生命和健康置之不顾的年代，以团结、尊重、互助为基础的情谊，可以突破地理距离和文化屏障”。

“中拉是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中拉青年是和平发展的青春同路人。”全国青联副主席傅振邦在本次中拉青年发展论坛上强调，中国与拉美国家都有受压迫的历史记忆，因此更加珍视独立自主、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他号召中拉青年做交流互鉴的促进者、合作发展的贡献者、多边主义的捍卫者，为中拉合作发展、世界和平发展不懈努力。

中拉青年发展论坛是中拉论坛框架下的重要分论坛，自2015年以来已经成功举办六届。来自拉美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青年领袖和青年代表，与中国青年一道，就国情发展问题进行深入友好的交流对话，传承和加强中拉传统友谊。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今年的论坛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办。

本报北京11月3日电